

在一个虚拟世界越来越发达、越来越玄幻的时代，谈论“在地”且有“实感”的故乡，不纯粹是怀旧，更包含一种文化理想与生活趣味

最忆是潮州

□陈平原



潮州开元寺(水彩) □陈高原

为家乡潮州写一本书，念头是最近五六年才有的。这一选择，无关才学，很大程度上是年龄及心境决定的。年轻时老想往外走，匆匆赶路，偶尔回头，更多关注的是家人而非乡土。到了某个点，亲情、乡土、学问这三条线交叉重叠，这才开始有点特殊感觉。在我来说，那是2016年。这一年，我印制《双亲诗文集》，撰写《五味杂陈的春节故事》《扛红旗的少女》，演说《六看家乡潮汕》，还与朋友合编《潮汕文化读本》，一下子把我与家乡的距离拉得很近。

谈论“故乡”，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心境

如何谈论“故乡”，这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心境。在一个虚拟世界越来越发达、越来越玄幻的时代，谈论“在地”且有“实感”的故乡，不纯粹是怀旧，更包含一种文化理想与生活趣味。谈故乡，不妨就从自家脚下(包括儿时生活及家庭故事)，一直说到那遥远的四面八方。

这就说到本书的性质，有论文，有随笔，有演讲，也有序跋，体裁芜杂，但主旨相近，全都指向“故乡情结”。因此，选择《如何谈论“故乡”》开篇，再合适不过了。第一辑“回望故乡”，既架开架势，又举重若轻，很能体现本书的旨趣；第二辑“故乡人文”，谈论俗文学、乡土教材以及张克生等，在在显示我的专业背景；第三辑“自家生活”，忆旧为主，琐琐碎碎见真情，也是本书最初得以推进的主要动力。

爱家乡与爱家人，二者互相叠加，情到浓处，方可可能笔墨生辉。各文之间互相引述，与其说是为了寻求呼应，不如老实承认，那是因缺乏整体构思，文章并非写于一时，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心境变迁一笔一笔涂上去的，故有的地方浓墨重彩，有的地方则云淡风轻。说到底，这是文章结集，而不是专门著作。

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几篇散文，说实话，关注的是家人而非故乡。因父亲及祖母先后逝世，我一子子坠入深渊。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只有过来人才能真切领略。丧亲之痛，本与籍贯无关，可无数远游的学子，在挂念亲人安危祸福的同时，往往不自觉地联想到家乡的现实处境以及文化传统。

真正促使我反省这个问题，是二十年前我在中大的导师吴宏刚先生之邀，撰写《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潮学研究》第8辑，花城出版社，2000年7月)。为了参加2000年1月在汕头大学召开的“丘逢甲与近代中国”研讨会，我第一次认真地从历史学角度谈论我的家乡：“在大江日夜东流，古今事变的《说潮》中，读者不难感受到丘逢甲借叙述潮州史事触摸这块神秘土地之脉搏的紧迫感。而在《和平里行》及其序言中，丘氏参与当地文化建设之热切，更是溢于言表。”当初写下以上这段文字，我自己都有点被感动了。

五年后的某一天，接出版社编辑来信，说他们的“广东历史

文化行”结集出版，希望我写一篇五千字的“引言”。阅读全文，紧赶慢赶，完成了这篇题为《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的引言(初刊《同舟共进》2006年第4期)。当初要稿要得很急，只给我二十天时间，可正式出版拖了好几年。若非应邀撰写序言，我对广东历史文化也不会如此全面了解的欲望与能力。有感于此，日后为《潮汕文化读本》写序，我再次强调：“有关乡土的缤纷知识，并非自然习得，同样需要学习与提醒、关怀与记忆。”

终于有一天，意识到“故乡”这个话头硕大无比，很难完美呈现。既然不是自传，也不是回忆录，只是关于自家以及故乡的文章结集，点点滴滴的故乡，长长短短的回忆，日后可以有续编，当下不能没有逗号或分号。与我此前刊行的诸多学术著作不同，此书更多蕴涵自家心情，聚焦在故乡与家人，还有我那早就失去的童年与青春。

几个“余波荡漾”的话题

书稿编好了，重读一遍，感觉最意犹未尽的是第三辑。其中好几个话题，我必须略加补充，让它继续余波荡漾一会儿。

自从父母亲搬回潮州西湖山后的农村宿舍，每年放假回家，我们不再跑到位于洋铁岭下的汕头农校了。知道学校还在，但随着时代变化，已日渐衰落。一直到2004年元月，我突发奇想，约上母亲与弟弟，一起回去怀旧。也幸亏有那么一次回访，拍了好些照片，可供我这次回插图。站在儿时生活的家属宿舍前，以及观看父母亲先后居住过的房子，还有老图书馆，真是感慨万千。今冬应校方邀请，探访重建后焕然一新崭新的潮州农校，还能辨认出来的老建筑，只有那间刻意保留的窗户破败但屋顶尚存的大教室。回京后，收到校方寄送的五百六张老照片，我一看就苦笑，那都是我离开农校下乡插

队二三十年后发生的故事。不能埋怨时间飞逝，只能说自己确实老了，这才汲汲于怀旧。年初在《潮州日报》连载四则“洋铁岭下”，引来很多围观，最有趣的是那则《我的语文老师》。好几位退休的校长及老师说认得那位教过我的“李老师”，提及名字则五花八门，全是读音问题。有一位跟我同届的，说李老师在汕头居住，几年前还曾回古巷找老同事聚会。这让我充满期待，于是委托汕头教育局及《汕头日报》记者帮我查询。最后得到的是线索是，李老师在属免的，七十年代末还在潮州乎中联中任教，深得学生敬重，之后调汕头，几年前去世了。一位帮助查询的朋友来信：“李老师如健在，看您的文章一定万分高兴。”这让我更加懊恼，为何当初只顾自己忙碌，没能早点撰文，向曾经给予我很大鼓励与帮助的金老师、李老师致谢？实在是追悔莫及。

第一次听著名文史专家曾楚楠和黄挺说我插队落户的响山村是历史文化名村，还以为是在开玩笑。仔细核对他们引述的资料，方才明白所言不虚。不过当初我在这山村生活/战斗了八年半，全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与感受。只晓得这村子背靠七星山，西临金沙溪，风景很不错。为了方便村民到山后耕作，半山腰开了个大缺口，据说破坏了好风水。我下乡半年多，就目睹一件惨剧——中午收工时刻，渡船因超载而慢慢下沉，本可滑到岸的，危急时刻有人跳离，失衡的渡船当即翻过去，好些妇女被扣在底下，于是七尸八命，整个村子哭声连天。高音喇叭响起，哭人们都涌向了渡口，那年我16岁，第一次如此直接且具体地面对死亡，那场景至今难忘，可说是下乡期间最惊心动魄的一课。金老师乃韩江下游的狭长积水地带，不是活水，当初觉得溪面很宽，很难游过去的；十年前回去，发现河道变窄，水也有点脏。好在近年此地被选址重建山

清水秀。两年前，央视戏曲频道拍“品戏读城”的潮州篇，邀我回去串场。听我谈及初下乡时吃过一个月的潮剧饭，还有我的诗/书作品“犹记巷头集长幼，乐声如水漫山村”，觉得很有趣，想以此为贯穿线索。后来发现不行，跑题了，“读城”变成了“读村”。编导割舍不下此等有趣场景，于是搞了个折衷方案，依旧回我回场山，拍摄我在陈氏家庙(原响山学校)与父老乡亲座谈，且与当年教书的同事合影；再就是转到如今变成乡村文化站的祠堂，听村民自娱自乐唱潮剧。节目播出时，这些难得的场景保留下来了，大家都很开心。

值得梳理的后续故事

1992年的《父亲的诗文》与2016年的《双亲诗文集》，当然应该对读。此外，还可以推荐初刊1994年3月18日《南方周末》的《风雨故人》。那说的是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访问台湾，打听《中华日报》的旧址，想到父亲工作过的地方拍照留念。主事者不在，女秘书殷勤招待，给了我若干历史资料。文中称：“不记得是谁的发明，将我作为‘故人子弟’介绍给女秘书。我很欣赏这一称呼，因其让人联想到‘风雨故人’的古诗。倘若没有这几十年过分稠密的‘风雨’，也就不会有我这迟到的‘故人子弟’之‘感叹亦敬敬’。”至于父亲晚年手抄的《北园诗稿》，大都写实与感事，引一首《闻歌有感》为证：“窗外人唱《乌溪顶》，惹得窗内百感生。天池乌溪迎旭日，跃马高歌抒豪情。光复逼迫二十载，壮志沉沉寸步行。明知圆缺寻常事，偏惹白头生。——《乌溪顶》是余于1949年夏在凤凰山乌溪顶为伤病员创作之一首潮曲清唱，解放后流行潮汕各县，并被改编为短剧。1969年夏，余在五七干校受管制时，听窗外管制人员高声大唱此曲，有感吟此。”

最后透个底，可能让人大跌眼镜。能考上中大，我已经很满足了，从没想过要去查分。两年前，因工作需要，查中大中文系到档案馆查了我当年的高考成绩：语文92，数学67，政治75，史地76.5——除语文外，各科成绩并不高，只是巧合作文满分，才有了日后诸多神奇故事。

《双亲诗文集》属于自费印行，赠送家乡亲友，还有对潮汕文史有兴趣的读书人。陆续收到反馈，包括补充若干没有入集的作品，比如初刊汕头地区文艺杂志《工农兵》1959年第1本的小演唱《乌溪歌声》，那是歌颂人民公社的，与上述潮曲清唱《乌溪顶》没有关系，作者为陈北、曾庆雍。

曾老师是潮州文化馆的专职作家，我在乡下学习写作时，得到过他的指点，去年撰写的《文化馆忆旧》谈及此事。文章发表后，我意犹未尽，想借此探讨基层文化活动如何展开。于是有了潮州日报社、潮州市文化馆、潮州市饶宗颐学术馆合办的“忆旧与追新——陈平原和文化馆的故事”主题文化沙龙，除了我做《在地化：启蒙性·参与感——文化馆的使命与情怀》演讲，更恭请当地著名文化人李英群、曾楚楠、丘陶亮、黄景忠等共同参与，谈他们与文化馆的缘分，以及构建基层公共文化生活的可能性。此活动吸引了不少潮州文史爱好者，而那篇初刊2020年12月8日《潮州日报》的《“乐声如水漫山村”——陈平原和潮州文化馆眼中的群众文化和文化潮州》的专题报道(江马铎、黄春生)，以及《何为“文化潮州”——写在文化沙龙边上》(那映纯)，日后流传甚广。

本书所有文章中，《永远的“高考作文”》后续故事最多，也最值得梳理。那篇写于1992年的随笔，结尾处兼及自得与自嘲：“大概，无论我如何努力，这辈子很难写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更让父老乡亲们赞赏的文章来了。”没想到，这还只是故事的开端，其后的逐步展开，更是大大出人意外。不说我自己撰文或媒体专访，就谈其如何成为“标志性事件”，汇入关于改革开放大潮的追忆与陈述。《文史参考》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高端时事/历史杂志，其2011年6月(下)“建党90周年专刊”，刊登《“文革”后的首次高考：陈平原的回忆》(《人民日报》)。央视十套(CCTV-10)的《读书》节目，2013年3月17日播出45分钟的专题片《我的一本课外书——陈平原》，节目最后，主持人专门赠我放大并加镜框的《人民日报》所刊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

一篇高考作文，竟有如此魔力，诸多戏剧性变化，乃大时代的投影。不是我特别能干，而是当代中国史叙述需要这一称呼，因其让人联想到“风雨故人”的古诗。倘若没有这几十年过分稠密的“风雨”，也就不会有我这迟到的“故人子弟”之“感叹亦敬敬”。至于父亲晚年手抄的《北园诗稿》，大都写实与感事，引一首《闻歌有感》为证：“窗外人唱《乌溪顶》，惹得窗内百感生。天池乌溪迎旭日，跃马高歌抒豪情。光复逼迫二十载，壮志沉沉寸步行。明知圆缺寻常事，偏惹白头生。——《乌溪顶》是余于1949年夏在凤凰山乌溪顶为伤病员创作之一首潮曲清唱，解放后流行潮汕各县，并被改编为短剧。1969年夏，余在五七干校受管制时，听窗外管制人员高声大唱此曲，有感吟此。”

最后透个底，可能让人大跌眼镜。能考上中大，我已经很满足了，从没想过要去查分。两年前，因工作需要，查中大中文系到档案馆查了我当年的高考成绩：语文92，数学67，政治75，史地76.5——除语文外，各科成绩并不高，只是巧合作文满分，才有了日后诸多神奇故事。



如同剪纸那样的形态

□陈履生

杨刚去世之后，人们发现他的存在。在生命的晚期，他在英年早逝前获得了很多生动的体育形象，这些人们所熟悉的体育竞赛中的动作，不同于人们所见到的常态化的一般性的人物造型，所以，杨刚的绘画特性就在于远离了常态化，呈现出了特殊性。其基本的特征就是：画其大概，不拘小节，以形写神，富有生气。在他生动的造型中，往往是在出其不意地抓住了人物造型中最为为核心的内容。这些画如同剪纸那样的形态，不仅放弃了诸多细节，而且也放弃了墨分五色。这是新中国美术教育培养出来的画家所具有的速写基本功。当造型以其整体性表现出人物造型的结构关系，人们所看到的构成则是那些关键的部分，简括到增至一

分不能，减至一分不可。在中国画的画面越来越复杂的当下，在越来越讲造型而忽视造型本质的今天，杨刚的画像教科书一样，可以给很多画家指点迷津。

杨刚把现实主义建立在自我表现的方式之中，并在脱离主流之外显现出了一种这个时代中难得见到的自由的状态。所以，杨刚的艺术有着独特的趣味并不是人们所说的笔墨，也不是人们常说的形式或其它，而是属于他的心中的自由。有了心中的自由，艺术就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采。

1月20日-2月15日，由深圳美术馆、北京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主办的《生·生——杨刚艺术作品展》在深圳美术馆举办。

教授，当有师德；受教，更当有学德

教授与受教

□刘诚龙

李鸿章说大清有个尖子班，班主任是曾国藩，他是班长，副班长也不争。左宗棠不会来争，正班长不聚会，活动中好几位老师提及我的高考作文，还披露了一个秘密——那年广东的高考作文题是中大中文系金钦俊老师出的。至于阅卷人以及是谁推荐给《人民日报》，可就无法查证了。

最后透个底，可能让人大跌眼镜。能考上中大，我已经很满足了，从没想过要去查分。两年前，因工作需要，查中大中文系到档案馆查了我当年的高考成绩：语文92，数学67，政治75，史地76.5——除语文外，各科成绩并不高，只是巧合作文满分，才有了日后诸多神奇故事。

李鸿章自称是曾班门生长，那我不是班长好手。老左确是争气的。曾国藩过世，朝廷谥曾师为文正，左宗棠双脚踏：他谥文正，我以后当谥武鄂耶？

李鸿章自封曾班班长，估计左宗棠不会来争，正班长不聚会，活动中好几位老师提及我的高考作文，还披露了一个秘密——那年广东的高考作文题是中大中文系金钦俊老师出的。至于阅卷人以及是谁推荐给《人民日报》，可就无法查证了。

曾国藩教李鸿章语文，教李鸿章军事，更教李鸿章德育。李鸿章自谓是班长，德智体劳事做了表率，智还不行，行事总是流里流气，痞里痞气，纪律性比较差。比如，爱睡懒觉，上课铃声响很久了，他还蒙着脑袋，在被窝里呼呼大睡。

“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南菜，得相欲逐不住，蘸辣酱好了，入口即能体验什么叫冬天的第一把火。”

得出几斤钢板来：“少茎，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筷子一甩，走人。这头留得李鸿章坐在哪里，如木雕一般僵了，“傅相为之愕然”。

这个事有点让人说烂了，无甚奇处了，一者证曾国藩当老师，当得严格，二者证李鸿章有些痞子气。舍此，这故事便没多意思了。其实不然，有谓这故事主角是曾老师，鄙人觉得，当是李学生。曾教授教教授，确乎严格，李学生受教呢，也是蛮认真。

李鸿章算是大学生了吧，有脸有皮，要尊严要面子，即使犯了错误，他也要老师春风风人，春雨雨人，和风细雨，和蔼可亲。曾老师却一点脸面都不给，严霜霜人，严冬冬人，把李鸿章晾在那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脾气若是躁的，也把碗一甩，“无他言而散”，脾气若更坏的，把碗往曾老师脸上甩去。常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其中之故，师非人，如何做得人师？其二，做人师，必驳人面子，必触人灵魂，这都是护卫蛮紧的，防守得蛮严的，不轻易让人碰的。

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教会变坏，当老师的，一味地对学舌甜言蜜语，不敢使用脸色，估计学生难成器；这里，也要表扬一下李鸿章，他对老师严肃教育，虽不痛快，却能承受，却能接受，他知道自己有毛病，毛病者，“才气不羁”，他老师“故欲折之使就范也”。松松垮垮，吊儿郎当，如何担得起中兴大清之大业？李鸿章明白了曾老师一番苦心，他也坦然受之。

教授，当有师德；受教，更当有学德。学德是，尊重老师教诲，老师严一些，老师凶一些，只要不是摧辱人格，只要不是摧折身体，都当虚心接受教育。曾老师教李鸿章做人要诚，脸色或者有点不好看，其心地却是蛮善意的，立意要李鸿章诚恳恳意人。这个事，证明曾国藩当教授，是好教授；这个故事，也证明李鸿章当学生，还算好学生。好学生之好，好在他能受教。虽然，毛病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李鸿章这个不太“诚”的毛病，后来依然有，但曾国藩严师教育后，到底改了不少，他后来担起大清大担，得力于曾老师教育得不错，他受教之心也可以。

苏州人烹调食物讲究一个精细，唯有对羊肉烹调讲究一个简单粗暴，大块炖肉不说，给的调料也只有一种：盐

藏书羊肉

□钱春华

回苏州老家探亲，妹妹两口子带着我去吃地标性美食——藏书羊肉。冬天吃羊肉，属时令进补，能找到一种秋裤都不穿穿的仪式感，这种活法太豪横了，所以，我们的羊肉进补之行说走就走。

是什么样的神仙小店，能承载我们心中的向往？我们去了一家叫老清泰的藏书羊肉店，扑面而来的只有热气、香气，没有羊肉特有的膻气，于是在带着包浆和划痕的桌子旁坐下来。

在此之前，我去宁夏旅游，吃过滩羊，是烤全羊，满盘子的调料盖着羊肉，深入羊肉肌理，跳入食客味蕾，麻辣鲜香，吃着

爽快，然而，穿过的衣服，也会带走经久不散的羊膻味，不经意间，就会让旁人打一个喷嚏。

我们点了一道羊肉汤，一道羊肉糕，一道白切羊肉，一个羊杂白菜粉丝锅仔。等菜之际，妹夫就开始讲述藏书羊肉的来历。位于太湖之滨的藏书镇，因为西汉朱买臣而得名。朱买臣是一位贫苦农人，爱读书，放羊时，因为埋头读书，使羊走失，其妻生气。每当妻子来山坡查看放羊情况时，他就把羊藏起来，等妻子走了才读。后面，朱买臣成为会稽太守，他所在的地方近太湖，有山名穹窿，泉水淙淙，草木茂盛，山羊肥美，清末时期，山羊

肉作为美食进城，苏州大街小巷兴起多家“羊作”，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牛杂店一样。后经过变迁，才叫“藏书羊肉”。

藏书羊肉的烹调手法中，名气最高的是羊肉汤，它与单县羊汤、海拉尔羊汤、简阳羊汤，并称为“中国四大羊汤”。藏书羊汤的最独特之处，在于用“杉木桶”熬炖，先将大块羊肉煮出浮沫，捞出洗净，再回桶熬炖，羊肉要连羊肚、羊肝一块炖，直到羊肉能用筷子插通而不烂，汤汁呈乳白色方可出锅。熬炖时，羊肉码在最下层，羊肚其次，羊肝在最上层，时间要两个小时左右。选用的羊，以二龄为佳。

苏州人烹调食物讲究一个精细，唯有对羊肉烹调讲究一个简单粗暴，大块炖肉不说，给的调料也只有一种：盐。汤清而不腥，喝一口，鲜美滋润，三天喝一次，妙不可言。羊汤浓香四溢，乳白鲜美，女人能喝出“美人脸”，容光焕发，男人喝了滋补肾气，仪表堂堂。现在也有店家，用钢桶炖羊肉汤，外面套一层木桶，从心理上就感觉欠缺了传统风味。

如果说，烹调藏书羊肉的秘密就是采用杉木桶，就是用盐，这肯定是不够的。藏书羊肉最大的加工特色，是去除了它的膻味，并不是它与生俱来没有膻味。而木桶，以用了百年的杉木

桶为佳。

为了迎合不同食客的口味，羊肉店的老板都会自制辣酱，方便食客蘸食。羊汤鲜美、羊杂鲜嫩、羊肉清香，你要觉得不够劲，蘸辣酱好了，入口即能体验什么叫冬天的第一把火。

据了解，随着名气的提高，藏书镇当地的羊肉供不应求，旺季时，各餐馆有八成的“藏书羊肉”采用的是从山东、河南等地运来的北方山羊。

我们吃的藏书羊肉，每斤要110元。山羊是吃草长大的，爬山爬坡，筋骨健壮，营养非，还要从远处运来，身价自然不菲。术业有专攻，这本身就就很叫人敬佩。